

劉鴻萬著

工業化與中國人口問題



國民經濟研究所主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0208



國民經濟研究所丙種叢書第六編

工業化與中國人口問題

劉鴻萬著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我國過去之人口狀況

第一節 人口數量之過多

第二節 人口品質之不良

第三章 過去我國人口狀況與工業化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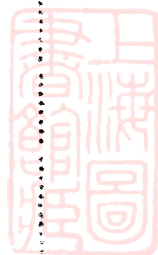
第一節 造成上述人口狀況之原因

第二節 上述人口狀況對工業化之影響

第四章 戰時我國人口狀況之變遷

第一節 人口數量之減少

第二節 後方人口絕對過剩現象之消滅對人民生活之轉移



第三節 人口品質與人民習性之改善……………二八

第五章 工業化與將來解決人口問題之方針……………三一

第一節 人民生活之提高……………三二

第二節 戰後人口驟增之限制……………三五

第三節 國內人口之再分配……………四〇

第四節 死亡率之減低與人口體質之改善……………四四

第五節 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與人民習慣之改良……………四六

第六章 結論……………五一



序

二十五年以前，筆者即主張我國必須工業化，並作文加以鼓吹；嗣後對此問題之研究與討論，未嘗或懈。在初國人多未加注意，然自抗戰軍興，工業化之需要乃深入人心，而政府且定爲國策焉，然一般論者，對於工業化，猶僅視爲工業本身之發展，而不知其他一切經濟事業，組織，以及政治，社會，文化等，在工業時代中，亦與前此者迥異，唯此種變遷大半屬於漸進性質，而時間先後尤不一致，故一般人不易感覺耳。然工業化之涵義固不專指工業一項，其影響所及，極爲普遍，故研究此項問題，範圍甚爲廣泛。國民經濟研究所同人及所外特約研究員，於二十九年，即從各方面研究工業化，分題擔任，從事撰述。每題皆經各同人詳加討論，一編撰成，復經精密審查，故雖爲多人所撰者，而每編皆足以表示全體同人之意見，研究宗旨任明了我國欲達到工業化之目標，在各方面所應努力改進之事項，並建議政府在戰時與戰後所宜採用之方針。唯戰時政府既隨時有新的設施，而經濟狀況又常有新的變化，每一稿成，輒須刪改多次。歷時數年，始克竣事，共成農業、工業、礦業、貿易、交通、貨幣、金融、人口、勞工、資金與企業組織及工業與我國文明，共十編，列爲本所內刊叢書。現經商務印書館允爲出版，各編已開始陸續付印，特綴數語，以誌原委。海內鴻達，希垂教焉。

劉大鈞重慶三二、九、二二。

工業化與中國人口問題

第一章 緒論

我國今後經濟復興唯一之途徑既爲工業化，而工業化最高之目標，不外於增加生產與改進人民之生活。但爲求達此目的，「人」的問題之探討實爲其一基本出發點。因欲改進人民之生活，則必須先知人民之生活狀況及其成因，而後可言提高其生活之方法；欲增加生產，則須於物的條件而外亦知其「人」的條件，始知其數量與品質是否適於此種增加生產之實行。如馬歇爾（Marshall）云：『財富之生產不過爲維持人的生存，滿足人的欲望，發展人的肉體心智及道德活動之手段，而人之本身，又爲產生以人爲最後目標的財富之主要手段。』（註一）實道破人與工業化之關係。

是以吾人之主張，一方既注重如何提高人民生活之問題，他方更顧及如何增進人民之生產能力。故於本文，首對我國人口之量與質兩方面之狀況逐一加以檢討，同時探究其造成原因，繼則闡明其與工業化之關係，藉知工業化對此種狀況發生何種作用，此種狀況對工業化有何種



影響，最後乃討論解決此種問題本身之方針。

故本文所述，實不限於討論純粹之人口問題。如人民習性雖為人口之精神上之屬性，通常並不在以人口之自然性質為對象之人口論討論之例，但一國經濟之進步繫於此種精神心理之實質多。如霍布孫（Hobbes）氏已早指出，決定今日各國工業發達之先後及其在世界上之地位，除其自然，經濟乃至歷史的條件而外，各國人民之氣質，亦為其一重要因素；故討論工業發展時，不能不論及人民之氣質。且我國今後工業化之趨向，不獨在改革我國現有之生產與分配制度，同時亦在形成人民之心理態度與觀念之改變，故人民習性之改革，本身實亦為工業化目的之一，更不能不於此加以討論。而同時關於人口論本身之重要問題，如人口之屬性，優生遺傳與選擇等問題，與工業化之關係較少，乃從略。

第二章 過去我國之人口狀況

第一節 人口數量之過多

關於中國戰前人口之總數向無完全之統計，近年所有較為正確之部份調查及估計，爲民國廿年內政部修正之民國十七年各省區戶口統計及二十三年郵局之郵區估計。依前者中國二十八行省之人口爲四萬萬三千八百餘萬，依後者爲四萬萬三千四百餘萬。再加入外蒙青海西藏各邊區之二百餘萬，共約四萬萬四千萬上下（註二），最近如卡爾桑得斯（Carr-Saunders）根據以前各私人估計之新估計亦爲四萬萬五千萬左右（註三）。

依全國總面積之人口密度每方公里僅四十餘人，此密度雖較歐洲諸工業國家疏稀，但已較加拿大與澳洲之每方公里一人餘，蘇聯歐洲部份之二十二二人，美國之十六人，越過甚多，此等人口幾全數含於中國之二十八行省內（註四），其密度已增至每方公里五十八以上，而此二十八省中人口之百分之九十上下（四萬萬二千餘萬）復集中於中國本部十八省內，但中國本部之面積不過三百八十九萬方公里，於是本部人口之密度即達每方公里九十人以上。在本部中大部份之人口更密集於下舉沿江河之少數平原地帶（註五）：



區域

面積(方公里)

人口

密度(每方公里)

(I) 中原區(即黃淮平原區)：

三十三萬

八千萬

二五〇人

(II) 揚子區(即江淮江漢平原)：

二十萬

七千萬

三一八人

(III) 東南沿海區(含廣東)：

五十五萬

七千萬

一三五人

(IV) 邱陵(華南華中北間之山地及南東半島)：

七十四萬

九千餘萬

一三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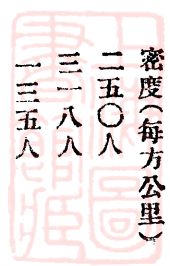
(V) 四川盆地：

二十萬

四千四百萬

二三〇人

在以上面積共約一百八十萬方公里之五區中含有三萬五千萬人，即全國人口之百分之八十；此時人口之密度遠每方公里二百人附近。此密度大於任何重要工業國家(註六)——如英國(英國本部三島)之一九六人，德國之一四四人，日本之一四六人，義大利之一三八人，法國之七十六人(註七)。且工業國家中密度雖大，但大都生活於大都會中，如一九三〇年美國之都市(居民在二千人以上者)人口佔全國人口之百分之五十六，英國(英格蘭與威爾斯)佔百分之八十，法國佔百分之四十九，德國佔百分之六十七(註八)。而中國則因尚係純粹之農業社會，都市人口依脫加雪夫(Torshelt)氏估計，包含多數鄉間與工業甚少關係之城鎮約為百分之廿(註九)。若專就稍有近代工業十萬人以上之大都會人口論時，則當佔全人口之百分之四上下(註一〇)，較德之百分之三十，英之百分之四十五，法之百分之二十六，日之百分



之二十五者所差至遠（註一一）。故前舉密度之人口在中國實密集於任何一窮鄉僻壤，如山東及揚子江流域一帶肥沃之村落地帶之密度，據克黑希氏（Chesley）所云甚至有超過一千人以上者。且此等人口之分佈就每家庭情形而論，亦呈飽和之狀況。如根據江寧縣人口之調查（註一二），將該縣農村家庭人口依其貧富程度在分時，富有者每家平均人數爲八，四，安舒者爲五，八而貧窮者則僅爲四，一人；卽就每家庭內之純家族分子而言，亦各爲六，八，五，七，四，一人，可知中國戰前之人口業已達每家扶養能力之最大限度。

由上舉人口總數，密度及其分佈情形看時，中國人口在國內主要區域密集之程度，實大於任何近代之工業國家，於是在中國現在落後之社會經濟組織下，乃形成絕對之人口過剩狀態。關於人口過剩本有種種不同之解況，如凱衍斯（Keynes）教授以爲二十世紀以來英國工人實質工資增進之停滯與失業之衆多，原因在英國人口之過剩；但比菲利基（Beveridge）爵士則以爲與人口過剩無關（註一三）。而湯溥生（Thompson）博士又以爲人口之是否過剩，實依存於對此過剩解釋之如何：『如吾人以人口過剩爲一種狀況，當尚有使用更多之人口以生產更大之實質收入之可能方法時，此種狀況不致發生，則英國無人口過剩存在。如吾人以人口過剩：爲在現在與短期將來亦將存在之情形下，有許多人口不能用優厚之實質工資雇用之狀況，則英國與歐洲爲人口過剩』（註一四）至若德義日等極權國家，對內則鼓吹增加生育以補救人力之不足，對外則宣傳國內人口過剩需要生存空間，更使人口過剩變爲一不可捉摸之概念。不過近

年來對人口過剩亦不乏明確定義之學者。如彌德 (Mead) 謂：「在一定之土地與資本下，若勞働之限界生產物小於平均生產物，則人口係超過其最適點 (Optimum point)。」其判斷之方法則在勞働之工資是否能吸收全社會之總生產物。(註一五) 此種界說在理論上固已較前人完善，但在自由放任之經濟制度下，當生產物全體不能歸屬於勞働時，並不能稱為人口過剩，此點，亦係彌氏所自認。

實則在近代工業國家中，所以發生人口過剩之議論者，乃因近年在此等國家中，一方不斷有大量失業存在，實質工資復停滯不進，他方一般生活水準雖甚高，但貧富距離日益增大，論者乃不深求發生此種現象之根本原因，而誤以為本國之人口過多，其所有之資源與市場不足使此種過剩人口全部就業，或獲得良好之實質工資。殊不知在近代工業國家中，大量失業之存在，實質工資之停滯，貧富懸殊之增大，皆在其經濟制度上之缺陷，而不在人口之過剩。因一方由生產之高度機械化，於是在資本構成上不變資本較可變資本之比例逐漸加大，以致所需之勞働力亦逐漸減少；復因機械之應用愈廣，商品之大量生產亦愈增加；而一般人民在現代分配制度下之購買力不能消費，以致生產機構亦不得不常有停滯，因此必產生大量之失業業者；此種失業者愈多，乃愈壓迫工資之低下，他方因生產手段之愈高度機械化，則資本愈集中，獨佔愈強化；資本集中與獨佔強化則財富與利潤愈集聚於少數生產手段所有者手中，於是貧富之懸殊乃亦愈甚。故在近代工業國家中，生產之能力實已使每一國民有享受高度富裕生活之可能，實

際上由平均數所表現之每年每人之收入亦係逐年增加，祇以生產機構運用之不善及分配制度之不良，乃發生失業與收入減少以及貧富懸殊現象，決非人口過剩之所致也。

但學者對工業社會中所謂之人口過剩現象，見解雖有不同，而對人口素多技術又無大進步之社會，若其人民生活程度低下，則無不認為係人口過剩之標徵。如卡爾森得新氏謂「任何國家在一定情形之下，假定技術無改進……則人口過剩之狀況反映於每人收入低下上」(註二六)。

生活程度之高下雖係一相對概念，但人民收入愈大，其支出用於生活必需以外之享用者愈多，其生活程度必愈高，反是則必愈低。中國人口在戰前百分之七十五為農業人口，此中除百分之十上下為地主及富農外，其餘皆為中農貧農；都市中除少數之富有階級與中產階級外，大多數亦為工人苦力僕役店夥之類，故吾人可斷定中國人口三分之二(註一七)乃至四分之三為貧苦之農工階級，而中國普通農民之收入每戶每年不過百元至三百元之間，其支出百分之六十以上亦皆用於食物上(註一八)，而此種食物亦多為維持最低生存之主食，不但肉類卵類不易一嘗，即新鮮菜蔬亦非常品，其餘用於食物以外之支出亦大部份用於衣服住宿燈火等生存必需方面。更因中國此種工業產品微少，即有亦不易達於農村以致一般農民衣既不足禦寒冷，室亦不足避風雨，遑論其他之生活享用。都市工人之生活，雖不失稍優，但亦只五十步百步間事。即使所謂之富有者，亦因中國經濟既以農業為主，而農業又多為小農制，土地所有權集中情形不

劇龐大之地主爲數無多；都市中除少數商業資本官吏資本外資本亦無大規模集中現象，故除少數沿海都市外，實可稱爲全國皆貧。

但生活程度之低下並不爲人口過剩之唯一證明。因縱令有充分之土地資本，而人口若過少，以致不能充分利用此等條件，生活程度往往亦有不能增高之時。不過我國人民生活程度之低下，即由前舉人口在可耕土地中集中之程度觀之，決非人口過少所致，其理昭然若揭，况對此尚有其他之標徵：可資證明，（一）無業者衆多之現象，過去在中國之都市與農村，隨時隨地皆可見多數之無業者。此種無業者係絕對缺乏工作機會者，並不似歐美工業社會之失業者，係一方有停工之生產設備，一方有不能就業之工人。故其因先人之遺業或親友之扶助而能生活者，乃成游手好閒或養等處優之寄食份子；其不能生活者乃流爲流民乞丐甚至變爲匪盜以造成社會之不安。（二）農民離地之現象，中國農民離地之現象已早爲學者所揭出，即依金陵大學之實地調查，中國內地之人口移動，以在省縣境內之移動佔鄉村人口移動之大部份而此等移動發生之原因除過去內戰等偶然事件而外，以缺少工作及田場缺少食物爲主（註一九），此亦不外證明在中國過去之生產方式下，農村人口之絕對過剩。

第二節 人口品質之不良

中國過去人口不但在數量上過剩，其品質上之缺點亦極多，此種缺點不但造成現代中國經

濟文化之落後，實亦影響及全種族之衰落。吾人茲就材料之所及，將構成人口品質之體質與心智兩部份問題略加述敘。

(a) 體質健康之惡劣：關於人口體質之良窳固有種種標徵，但其重要者則為健康與體格。對健康與體格是否優良吾人可用人口之死亡率，平均壽命以及人民之平均身長與體重等既有材料而加以判斷。

中國人口之死亡率，依公私之各種調查，大約在千分之三十上下。此不但較現在英德之千分之十二，日本之千分之十七高出一倍上下，即與印度之千分之廿四（註二〇）相較，亦有遜色。

關於中國人之平均壽命雖無精確之統計，但據廣東中山李氏家族壽命表之研究（註二一）已發現兩點：（一）中國人之平均壽命較歐美人低。（二）歐美人口之平均壽命係呈漸增傾向，中國人者則呈漸減傾向。更由北平市（民國七——九年）簡略生命之研究（註二二）中國人十二歲之希望生命為四十三年，十七歲者為四十一年，最近據金陵大學民國十七年至廿二年之十六省農家人口調查材料，推算我國農村人口出生後之平均希望年齡為三十五歲附近（註二三）。而一九三〇年德國人口之希望年齡，零歲者為六十年，十五歲者為五十三年；英國人各為五十九與五十一年；法國人各為五十四與四十八年，甚至日本亦為四十五與四十四年，皆較中國為高（註二四）。至若中國人之體格，由下表中英兩國人民之平均身長與體重之比較；

(註二五) 其惡劣亦屬自明。

中英兩國人民之身長與體重表

	男(一二二)歲		女(一二二)歲	
	身長 公分	體重 公斤	身長 公分	體重 公斤
中國	一六九·二	五九·八	一五八·〇	五〇·五
黃河流域	一六五·一	五二·六	一五四·〇	四八·二
長江流域	一六三·〇	五〇·四	一五一·四	四六·〇
珠江流域	一六五·八	五四·三	一五四·五	四八·二
平均	一七一·〇	六七·二	一五九·九	五六·一
英國				

(b) 教育程度之低下，關於討論人口品質之心智方面，通常須涉及智力與天賦問題。但此等問題本身尚無完全客觀可靠之標準，雖根據已往各種測驗之結果，已證明中國人之智力決不在歐美人民之下，但人類之智慧依存於其後天環境及經驗者究竟較獲諸天賦者為多。而後天環境尤以教育為最重要，儻無普遍與良好之教育，即最高之天才亦無從啓發也。

我國戰前文盲之多，任今日世界大國中實居首位，雖無適當統計調查，但通常謂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恐非過甚其辭。至若曾受新式教育者，為數更屬微小。如在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間，全國受初等教育者僅一千一百七十餘萬人，受其他成人或公民教育者更有一百二十餘萬



人，受中等教育者僅五十餘萬人，其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即每千人中僅有中、小學學生三十人，以此與蘇聯（一九三九）之一八二人，英國（一九三五——三六）之一四五人，法國（一九三六——三七）之一三六六，德國（一九三七——三八）之一二八八，義大利（一九三六——三七）之一二〇人相較（註二六），落後之程度不言而喻。至若中國之受專門以上之高等教育者，該年僅四萬餘人，換言之，每萬人口中僅四人，即與蘇聯每千人中四六人相較，亦遠不能相及。

（c）人民習性之不良：吾人此處所謂之人民習性，係指一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由一定之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制度所養成之特性：此種特性或屬於人民精神與心理方面，或屬於人民生活習慣方面，但此種習性種類頗為複雜，其概念限界亦極曖昧，且此種習性既係由環境所養成，則亦常隨環境之變遷而消失或改變，故實難謂某種性質即為該國人民固定不易之習性，不過在一定時代，同時與其他民族相較，則亦不難發現。一國人民之特殊習性。如中國人之自私心理，家族鄉里觀念等，即係通常為人詬病之所謂中國人民之國民性。

茲先就中國人之自私心理論之，處於過去之中國社會中，凡冷靜之觀察者，無論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事業上，莫不感覺中國人對人則妬嫉心重，寬恕心輕，喜挑揚他人之短處，不欽佩他人之長點，不肯讓步，不易自省，不能誠懇坦白，往往互相敵視輕蔑：對事則缺乏合作心與服從心，缺乏為大我而犧牲小我之精神，非假公濟私，即公私不分，更甚者則極損人利己之能

事，凡此種種，莫非極端心理之表現。此種心理小則防礙社會之和倍，大則釀成社會之紊亂。

但圖謀個人私利之心理，在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即被認為推進社會發展之一種原動力。

如休謨（Hume）以為在經濟上個人利益之追求，即得社會公共利益增進之結果；亞當斯密

（Adam Smith）以為自由之個人活動，常予社會以有最利之效果；至邊沁（Bentham）則更以

為組成社會之個人常為其自身幸福之最上判斷者，個人以不斷追求自己之幸福，而個人私利之

追求，即造成社會之利益。故依此種主張，個人利益之追求，同時亦為社會之福利；自利不但

非人民之缺點，反為社會之美德。不過此種自利主張之所以能成立者，實有兩種根據。第一，

在理論上此種主張皆係假定個人之利益係與社會全體之利益一致，如斯密氏謂個人根據其自

私心而為自己之利益活動時，不期即可增進社會全體之公益；邊沁氏以為社會之利益即為構成

此社會個人利益之總和。第二，在實際上當此學說盛行時，英國之社會經濟狀況，內則為工商

業，外則為對外貿易與殖民地掠奪已較他國發達之際。故一方面政府國家對個人事業之干與督

實，反不如委之純粹個人之經營為有效；他方面國內工商界個人追求私利之活動，最終皆可

為向外之發展，其行動縱有惡劣影響，亦皆係轉嫁於殖民地或對手國，對於英國本國則此種行

動不但確可增加社會全體之利益，且為保護與推進此種個人追求私利之活動計，更增進國家社

會與個人間之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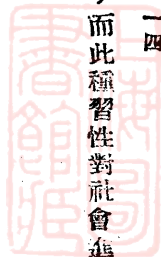
不過若自利之追求不能與國家社會之利益相合，則有百害而無一利。故在當時後進之德國

即曾認清此點，極力倡導個人之私利活動須先顧及國家之利益。如李士特（L. S. Steiner）即謂個人之利益須附屬於國家之利益，是以此種自利主義之提倡，實僅適用於當時英國之環境，今日不但已知個人私利往往多與社會利益不一致；且英國當時之環境亦不復發現於其他現代國家。現在則將此種態度變本加厲，尤非良好現象。

至於家族觀念與鄉土觀念之濃厚，亦為我國人民重要習性之一。家族觀念本非我國人民獨有之特點，實存於任何國家。如英國即為歐洲極重家族觀念之國家，不但英國在工業化初期各種事業之舉辦皆以家族為中心，即現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門閥關係亦佔重要地位。不過家族觀念在中國實特別濃厚，不但在社會生活上，家族為人事關係之一基本樞軸，即在社會道德上，家族觀念往往亦為最高之倫理範疇。鄉土觀念不過家族觀念之一種擴大，雖不如家族觀念之明顯深刻，亦為規定中國社會中人事關係之一重要原則。此兩種觀念皆可視為自私心理之延長，推至其極，則一方面家族與地方之利益超過一切正義觀念，其他一切亦皆可為家族與地方之利益而犧牲；他方面社會上一切之事業與工作之分工決定於家族地方關係之深淺，而不決定於個人之能力。此種現象既阻礙個人能力發展，減削社會自然淘汰之作用，同時又防礙各種事業工作之進行與發展。且此種觀念亦阻撓人口之遷移與人民向外發展之精神，以致防礙人口過剩之解決，並養成今日中國人民故步自封，退縮保守之態度。

此外我國人民之因循守舊，知足聽命，責任心輕，正確感與時間觀念薄弱，缺乏創造進取

之精神，缺乏冒險嘗試之勇氣等等，皆爲吾人所熟知之農業社會之習性，而此種習性對社會進步之阻礙，亦更不待言。



第三章 我國過去人口狀況與工業化之關係

第一節 造成上述狀況之原因

上述我國人口數量與品質習性上之問題與缺點之形成，自其歷史文化經濟以及風俗習慣上之種種原因在，但此中實以經濟上之原因爲最重要。中國過去之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係既皆在農業階段，則中國社會中之各種社會經濟乃至觀念形態上之問題，皆不得不受此農業生產方式之規定。如就人口過剩而論，一國人民既專事農業，則人民之生活不得不專賴土地之生產物。但土地生產物數量之多少主要繫於土地之大小肥瘠，無論耕種技術如何進步，其產量皆必上有一定之天然限度；於是人口愈多，每人所能得之物資亦愈少。設耕種方法陳舊，則爲求一定數量之收穫，即需極多量之人工，若欲求少數產量之增加，依收穫遞減法則之作用，必須更增加多量之人力，於是農村中乃不得不常有大量之人口存在。且此種人口亦必密集於少數土地肥沃區域之中，如過去在陝甘區域雖不乏可耕之土地，但欲自此種土地求得一定之產量，即必須動用多數人工，但若所用人工過多，則其產量又不足維持此多數人之生活，結果反將招致荒歉，故不得不聽其荒蕪。是以欲在純農業社會中維持生存，則必須有大量人口，而此大量人口



又永不能獲得更多之生活資料，於是其生活即須永遠貧苦，自屬必然之結果。

同時農村人口雖多貧苦，但依過去之經驗，其出生率仍極高，其死亡率雖因生活與衛生之惡劣亦甚高，但仍使人口繼續膨脹，直至生活資料所能支持之最高限度，始被自然災害或人為變亂所阻止。中國過去農村人口之出生率據各種公私估計約為千分之四十上下，死亡率為千分之三十上下（註二七），但都市中出生率較低，再除移出之影響及估計之誤差，則自然增加率當為千分之八，此與威爾考克斯（WILCOX）及卡爾桑得斯兩氏之估計相合（註二八）。雖較歐洲人口之增加率稍高（中國由一二五〇至一八五〇年之二百年間增加約為五倍，而歐洲則由一六五〇至一九三〇年間始為五倍），但並不能謂為特別巨大。祇以中國之歷史甚久地域甚廣，文化與農業又皆早已發達，故其增加率雖非過高，但其增加之絕對數則極衆多，於是乃造成今日之龐大人口。此等龐大之人口既須全賴農業以生活，而土地既有限制，技術又無進步，是以中國之人口過剩狀況，乃亦不得不更甚于其他農業國家。

就體質而論，更須歸因於農業社會之一般貧乏。如死亡率之高於壽命之短促，其直接原因雖在衛生之缺乏，醫療事業之幼稚；但其所以缺乏或幼稚之根本原因，又在農業社會物資生產之寡少，人民收入之低微，以致社會既無力設置充分之醫療衛生設備，個人又無豐富之營養資料。例如在中國都市中一般之死亡率較低於農村，而農村中富有者之死亡率又概低於貧窮者（註二九）亦莫非由於前二者生活之較優裕，後者生活之困苦之所致。

就教育言，在農業國家中政府與人民之收入皆極低微，不能有普遍教育之設施固不待言；而在農村社會中，青年子女在其幼時即須補助農村工作，實爲農場上不可缺乏之一種勞力，且農業工作異常簡單不需專門學習，故一般農民除欲使子女將來更改職業外，往往即有機會亦不願使其子女就學。

至若中國人民自私自心理家族與鄉土觀念之養成，原因則稍複雜。第一因中國在數千年之歷史過程中；與外族接觸較少，即有接觸爲時亦暫，不似歐洲各國之常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摩擦中求生存，以致個人生活行動皆以個人或家族爲中心，個人利益之追求亦只以個人或家族乃至鄉里之利害爲判斷標準，無更高之利害相共的生活團體爲其生活行動之最高軌範。第二因中國處於封建社會者過久，特權階級與廣汎之非特權階級對立，前者視政府與權力爲壓迫榨取之工具，後者不但在個人自由被束縛，在政治上，市民權上，經濟上皆未被視爲平等之個人，即生命財產亦無切實保障。於是國家社會與個人間無利害一致之聯繫，以致個人之行動亦不得不純爲其一己或其家族打算，有時依家族或鄉土關係之聯合，更當爲自我保全之必需手段。

但其基本原因，仍在中國過去停滯於農業生產階段者過久，因在農業社會中，共同生活範圍多限於農村，交通又極不便，對外之接觸稀少，故其生活意識亦幾完全孕育於狹小之家族鄉土範圍內。且農業生產方法大都簡單類似，不需緊密之分工合作，以致人與人之間亦不易造成相扶互助之習慣。更益以人口之過剩，每人所能得之物資經常即極稀少，於荒年時爲尤甚，於

是多數人爲爭取此有限之物資，能得者生不能得者死，使生存競爭之人類本能，是以一已或與其關係最近者之利益乃必超過一切。世代相因，此種心理習性，乃形成個人處世求生之潛在本性。

關於中國人民之因循守舊，欲創造嘗試意識，知足聽命，久積極進取精神，無時間觀念，無責任心，無正確感等習性，更完全係發生於農業生產之方式。因農業生產賴天時自然者多，賴個人努力者少，其生產時間冗長而不固定，生產方法又極單純，故個人無可負之重要責任，亦不須寶貴時間，更不用極度之正確。其使用之工具多屬簡陋單一，少改良之需要，自難啓發創造之意識。工作範圍與生產結果以及其市場皆有一定之限界，不必應付市場之變動，又缺少事業競爭之對手，自不易鼓勵進取之機警精神。

第二節 上述人口狀況對工業化之影響

上舉我國人口過剩與品質習性之惡劣，對我國文化社會經濟之發達曾爲一重大障礙，已不待說明，即對工業化之進行影響亦非良好。如人口之衆多通常自皆視爲促進工業化之良好條件（一）工業化發展後，社會上之各種分工必愈趨細微，須有充分之人口始足擔任；（二）近代工業之資本設備，因技術上之理由有一定之最小限度，如其所用之人工不達此限度，則資本設備不能充分利用，以致生產不能達其最高水準；（三）在今日各高度工業國競爭市場之情形

下，欲維持生產之增加必須先有廣大之國內市場，而對此須以鉅大之人口爲其必需條件；（四）國內人口衆多，則其所消費之必需品——如紡織品建築材料食品等——皆爲需鉅大資本設備之工業，由此可促進國內大資本工業之發展。故當一國家走向工業化之途途時，若僅具其他一切條件——如資源資本以及近代技術，而人口過少，高度之工業化亦難達成。如美國工業化之初期借重移民，以及澳洲與加拿大之至今日尙未成重要工業國家者其本國人口之稀少實爲其一主要原因。但衆多之人口對工業化之發展能發生此種良好作用者，係在人口雖多而並無過剩現象；人民生活亦尙相當優裕，購買力亦尙大之時。若人口業已過剩，生活業已異常低下，此過多之人口，則反成工業化進行之障礙。

蓋由本叢書首卷所規定工業化之界說中，知我國今後之工業化在各種事業之機械化與大規模生產，但人口過多並不易促成此種機械化大規模生產之完成。因（一）在一國內資源與資本之儲存常有一定限度，人數愈多則每工人所備之資本與資源亦必愈少；若人數多至超過細微分工與資本設備所能利用之限度，則每人之生產量亦乃愈減，而大規模生產之利益亦愈少（註三〇）（二）每人之生產量既愈少，則每人之收入與購買力乃亦必愈低微，於是人口雖多，並不能爲大工業產品之尾閘。（三）人口過多勞工之供給亦必過剩，工資亦必低廉，於是在許多生產程序中機械不易代替人工。如工業革命之前，法國之人口倍於英國，而工業亦盛於英國，但工業革命終發生於英國者，欲積極應用機械以補人力之不足，即其重要原因。（四）今

後之工業建設必借重大規模之電氣化，但欲電氣之能普遍用於工業，即必須同時增高人民日常生活對電氣之消費，用電氣之工業消費若不伴以家庭用電之增加，其成本與價格即將過於昂貴（在戰時電力缺乏時，自不能一概而論），於是即將加重工業製品之成本，而減少其競爭力。（五）如人口過多，一般人民必皆極度貧乏，於是鉅量國內資本之籌集因屬不易，即對外資本之引誘，力量亦較薄弱，因外資流入之鉅細，多以該國人民購買力之大小為轉移。

縱令人口衆多可增加財富生產之總量，但工業化之主要目標既在改進民生提高人民之生活，而人民生活之最優裕狀況——即人口之最適狀態（Optimum condition）係在求得每人之最大經濟福利，而不在求經濟福利之最大總量（註三一），故即使財富總量增加，若個人所得者反微小，則吾人之目的仍不能謂為達到。故今日工業發達人民富裕之國家，皆為人口數量較少之國家，而非人口絕對衆多之國家。

體質惡劣對工業化之影響可表現於工作效率方面。因近代工業工作不似農業工作之散漫遲緩，大都須極度之注意與緊張，此則非有強健之體力不可。即如壽命之長短表面上雖似與工業化無直接關係，實則影響亦甚大。因近代科學之進步使工業上之工作過程極為複雜，其學習往往亦需極長之時期，若人民之壽命短促，則其一生多耗於學習上，而應用之期間短少，不但社會上蒙極大之損失，亦永不能獲得多量之工業上經驗純熟之人員。

教育不普及對工業化發展之影響更為廣汎；因近代工業工作之學習，大都須先有基本之教

育始能入手，如目前各工廠對學徒之採用，最少亦以小學卒業者爲合格。卽對機械操作之也，勢必須應用文字與算術等知識也。假定中國人口中曾受基本知識者不過百分之二十，則今後工業化中所需之人力必皆取給於此微少之人口；是則雖有鉅量人口，對工業化之貢獻亦並不多於少量人口也。

人民習性不良阻礙工業化之發展，亦至明顯，因近代工業成功主要因素之一，實在社會成員間完善之協力與分工；不但在生產技術上需如是，卽在組織上精神上亦莫不需如是。而此二點之達成一面須工作者有勝任之能力，他面更須有顧及全體之精神。過度之自私心理則缺乏合作心理，無服從及互讓精神；濃厚之家族鄉里關係，則使人事不能相合，有能者不在其位在位者未必有其能，以致協力與分工皆不易發揮其固有效能，中國以前所辦多種近代事業之失敗，以及今日多種近代事業之效能低弱，此實爲其一重要原因。其在生產力未發達之國家，於個人有利之事業，不必與全國生產之方針相合（如奢侈品之生產），故爲提高一國之生產力，往往必須犧牲個人之利益。

至若其他農民習性對工業化之影響，則更不待論證。如習性保守則不易促進技術之改良，不重責任則不易使其工作進行圓滿，皆屬日常習見之事矣。

第四章 戰時我國人口狀態之變遷

第一節 數量之減少與分佈之變化

前述我國之人口狀況，自因此次之抗戰而發生變動，其變動在數量、分佈、生活情形以及品質習慣等方面，皆極爲明顯。關於數量方面者，則見絕對之數量減少。在戰爭中人口數量之減少，實係必然之現象，發生次種減少之原因，實有直接與間接兩種，其直接原因，自爲前線士兵與人民因戰事直接所受之死亡，以及後方因敵人空中襲擊所生之死亡。由空襲所受之死亡，因中國地域龐大，後方人口又向無大量集中，且敵人空襲力量亦較微弱，我國主要都市之防空設備，亦極健全，故所受之損失至爲微小，可不必計入。但前線之死亡，則在絕對數上，應相當可觀，對此雖尚無完全之統計報告，但僅在民國二十八年底，據外人估計，我國士兵因戰事死傷尚非甚多（註三二），但其後會有不少激烈戰役，益以我方設備之欠缺，死亡數目必大有增加。且在戰區與淪陷區內，因我國交通素不發達，人民之撤退不易，而敵人又向無戰爭道德，故平民之被虐殺者，爲數必更不少。

不過此等死亡在絕對數上或似甚鉅，但我國人口總數素多，由其在总人口所佔成份推測



時，影響尙不致甚大，若戰事不致再過度延長，則此種減少亦不致再有若何增加。戰時影響人口減少之間接原因，主要者自爲出生率之降低，與死亡率之提高。

戰時出生率之減退，實因下列各種原因，而爲習見之傾向。（一）戰時壯士出征服者甚多，自減少生育之機會；（二）戰時死亡者多爲屬壯年男子，其成份在總人口中雖不爲太多，但在婚姻年齡人口中應爲相當數量。（三）戰時人民生活不安，減少父母將子女之欲望。（四）戰時人口移動頻繁，減少人民安居之期間。由此種種原因乃使一國之人口，在戰時除戰事之直接死喪以外，亦不得不減退。故如德國在上次大戰前之出生率爲百分之二十，開戰以後即減低至千分之十四五。其人口總數，在一九一四與一九一五時，爲六千七百八十餘萬，至一九一九時，即驟減爲六千二百餘萬，而其中戰死者不過二百餘萬，是以戰事間接之減少即當在二三百萬附近。

不過戰時生育減少雖爲常見之現象，道非必然之現象。依前舉條件之強弱，可能發生相反情形。如此次歐戰中，英國在一九四一與四二年之出生率即較戰前爲高，尤以一九四二年者，爲十四年來之最高出生率（註三三）中國人口社會情形之不同，在戰時之間接減少當不致如過去他國之巨。（一）因中國爲農業社會，尤大之人口散在農村，且農村中過去對天災人禍，亦曾頻繁遭遇，並未若何影響及其生育之減少。此次抗戰之期間雖較長，範圍亦極廣，但除直接會爲戰區之地域，對生活日所生之影響，當不致如他國之巨。（二）中國人口之性別構成，

向爲男多於女，依各種部份調查，男女比例當在一〇九與一〇〇之比上下，更以青壯組之超過爲最多（註三四）此已較印度一九三一年時一〇六與一〇〇之比（註三五）爲高。至若在都市中男子之超過尤甚，如以滬漢平津廣州南京各地之情形看時，似爲一五〇與一〇〇之比（註三六）故此須抗戰雖犧牲不少青壯年男子，但不必即能全部影響至生育上。況此等出征之壯丁，復多爲無家室者。（三）戰時之移動雖大，但多爲都市人民，農村人口移動較少；（四）戰時生活雖較戰前艱苦，但戰時社會秩序與治安亦大爲進步，故除戰區外，人民亦未見不能安居。

故中國在戰時生育雖必有減少，但除非戰時再極度延長，不然恐不致有過去歐美戰時生育顯著減退之情形。

死亡率之增加亦爲戰時之必然趨勢。因戰時生活之艱苦與緊張，營養資料之缺乏，醫藥與衛生設備之不備，皆將使死亡率增加。不過對此點吾人完全無可資論證之材料，但因戰時生活之秩序化，與衛生提倡之努力，減少死之因素亦在作用，故恐亦無甚大之增加。

此次抗戰中對人口數量影響較大者，與其爲絕對數量之減少，無寧爲人口之移動，即人口分佈變動。自抗戰以來沿海沿江逐漸淪戰區，而戰區都市尤爲敵人肆虐之目標。故即發生三種移動情形：一爲戰區人口普遍向後方移動，尤以沿江海人口素密之平原地帶，移入西南西北等高原區域及四川盆地者，爲數實極多，二爲淪陷區與戰區都市人口，向偏僻鄉村移動，因敵人

侵略之目標及據點既在都市，則向在都市中之人口，除老衰及無力或不及逃避者，尙皆四散逃避，但此種逃避之人口或因交通工具之缺乏，或因在畢鄉謀生不易，有一大部份皆必逃歸鄉里，於是淪陷區都市人口乃大爲減少，三爲後方都市人口之集中，因流入後方之人口，在後方農村中多無生活根據，同時後方農村亦多不易容納新來之藉者，故幾全集聚於都市，如昆明人口原僅數萬人，戰即驟至十餘萬人，重慶則在民國二十六年底時，全市人口僅四十七萬，至三十二年底即已增至九十三餘萬人。至若其他較小都市及縣城，凡屬有新創事業或爲交通通道之處，人口莫不數倍增加，同時因戰時後方工商業之發達，農村人口徵調之頻繁，即後方人口亦大量向都市集中。對此種移動，吾人雖無數字可考，但其傾向至爲明顯，且其對人口狀況之其他變動，影響亦至彰著。

第二節 後方人口絕對過剩現象之消滅及人民生活之轉移

在戰前我國人口之普遍貧苦及人口過剩狀況已在第一章中指出，但隨抗戰之進展，此種過剩現象最少在後方業已消失，無都市或農村，已不復再有若過去之大量無業與失業者存在。此固係因兵士之徵調，抽出不少人口，但後方大規模之經濟建設亦爲減少人口過剩之主要原因。因在戰時後方，不但交通水利，在極大物質缺乏之情形，有極大之發展，即工業建設與交通之開發，亦日有推進，故就業之機會大爲增多，因此乃吸收巨量之人口。

至若後方人民之生活，一方因戰時社會購買力之膨脹，個人收入之增加，就業機會之廣大及過剩人口之消滅，一方因後方新建設之發生，由外界物質之湧入，以及邊地之開發等原因，於是經濟狀況乃極度活潑，而人民生活亦提高之現象。

不過戰時我國人民生活之是否確實提高，須分就數點觀察：第一、所提之生活，究係僅指個人生活中之貨幣支出而言，或其實質生活亦確已提高？第二、各階層人口生活是否普遍提高，或係各階層人口生活上發生轉移？第三、後方與淪陷區人民之生活是否有別？

對於第一二兩點，吾人雖知抗戰以來，各階層人口之貨幣收入莫不有顯著增加，但物價則有更劇烈之上漲。且各層人口貨幣收入之增加亦有大小，故欲判斷各層人口實質生活狀況，實以其是否實資產，或是否能利用物價之驟漲而從事正式或非正式商業而定。

就實資產而僅賴出售勞力心力以維持生活者言。收入增加最高者為工人階級。如為民國三十一年底重慶市自由工人之工資收入已增加至戰前之四十餘倍，即工廠工人之工資實際收入亦近三十倍，但若僅就此種工資收入而言，以之與物價相較，工人之生活仍屬進步。因前者之真實工資實已減退百分之二十以上，而後者之真實工資則減為戰前之半數。不過工人工資收入上之實質減退，實有他方面之補充。（一）因後方勞工之缺乏，不但無失業情形存在，即工人家屬亦有就業機緣，由此可增加工人階級全體之收入。（二）工廠工人除其工資收入外，工廠方面多另供給膳宿，並有其他福利設備，有時亦扶助工人之家屬，故其所獲不能以金錢計算之享

用，往往超過其工資。故就工人全體而論，生活並不較戰前惡劣，且對少數有技術之之人，更有個別之提高。

農民之收入雖無數字表示，但農產物與農地之價格係隨一般物價而上漲，故農民之生活亦當有顯著之改良。但由農產物及農地漲價之利益，實為土地所有者之所得。土地所有者不外地主與自耕農所有，自耕農之農產收穫大部須以之供本身之消費，所餘者亦須以之價格上漲更烈之農用品之補充，故除少數能節餘其收入以更從事商業之經營者外，決無餘力以提高其本身之生活。是以農業上在戰時受特殊利益者幾全限於地主，至若貧農與佃農則反因土地之漲價而有耕地被地主收回之傾向，故更無由自農產物與土地之漲價收入而改善其生活。不過此種農民亦因農村過剩人口之消滅，及兼業餘機會之增加，亦不致如戰前之永被束縛於農村，而忍受極端簡陋之生活。

故就人口中之最大多數之農工人口而言，在戰時實質生活雖不必較戰前提高，但恐亦決未若何降低。

在此次抗戰期中，生活降低最劇者，實為工農以外之其他一切無資產而依賴定額收入之生活之人員，由士兵以至各級公務人員，其收入之增加不但遠在物價上漲程度之下，即與普通出售勞力者較亦瞠乎其後。此等人口在總數中所佔成份雖不甚巨，但皆為社會之中堅活動份子，故其生活之降低，影響亦極著。

戰時生活大爲提高者，實爲有資產或能利用其資產以從事兼營商業之人口層。此等人口皆因資產及其產品之漲價，其收入乃亦與物價之上漲而劇增。且其所增之收入甚少能以投資從事再生產，多以之消費，故生活乃大較戰前提高。且亦因此種人之消費而引起市面之繁榮。但此種突佔全人口中之極少部份，且其提高亦係由犧牲大部份人口生活之所得，並非由實質生產與財富增加之所致。故在戰時後方一般人民之生活雖不必普遍較戰前降低，但已較戰前有顯著之轉移，且若戰時稍再繼續，外貨之運入逐漸減少，後方生產增加又無法迅速提高，則減退之情形，亦將普遍化矣。

第三節 人口品質與習性之改善

隨此次抗戰之進展，我國人口之品質與習性亦大有改變，就前者而言，人口品質之變遷首自爲體格健康方面。關於戰時人口品質之變更，吾人尙無可資判斷之材料，但據一般情形推論，則有兩種相反之傾向。即在後方人民體質趨於優良之成分居多，而在淪陷區內，則趨於更惡劣之成份居多。

在戰時後方影響及人民體質之因素亦有相反之兩種：其足使人民體質惡劣者，則爲後方物質之缺乏，人民之營養資料不足，生活過於艱痛，以致體質愈趨於惡劣。關於後方人民生活之惡劣化方面，如前節之所指出，除一小部份人口外，確有此趨勢。吾人對於雖無具體判斷之材

料，但僅就學生之發育與營養而言，據二十九年各地大中小學學生體格狀況報告，謂發育與營養能列入甲等者不到半數（註三七）學生生活雖向屬清苦，戰時因家庭接濟之不易，自更不易改進。但後方之生活資料戰時並無甚大之增加，且既有之消費物質亦多被少數戰時暴富階級所消耗，則大多數人民之生活自不能增進，故其體質，亦不望其因生活與營養方面有所改善。不但後方人民之生活習慣則因戰事亦有重大改變，不僅過去社會上損害健康之惡習逐漸消除，尤以煙毒之絕滅為最有益。同時因後方工作之緊張，與各種訓練之嚴厲執行，人民亦漸習於有規則有紀律之生活。又因政府之努力推行教育與衛生宣傳，人民對衛生知識與理解亦大為提高。凡此各點皆為使人民體質改進之因素。

以此兩種因素相衡，則使體質惡劣之因素作用較大，故後方人口之體質可斷其必已提高。至若在淪陷區內，則無論何種情形皆在使人口之體質惡劣化。淪陷區內人民之生活，經敵人之剝削日趨困苦固屬目明，而敵人在此等區域內摧毀我人民之方法，尤屬可懼。凡人類所認為除直接殘殺外，消滅一整個人口之方法，無不為敵人所利用，若敵人佔領之期間不長，則尚易補救，若戰時再有相當延長，則此種損失在戰後將非短時期內所能恢復者矣。

我國人口之教育程度在戰時後方確有長足之進步，因抗戰以來，政府即努力於各種教育之推廣，如大學因用貸金等制度，已成一種半義務教育性質，而後方中小學之增設不遺餘力，以致戰前無力求學之子女，戰時亦皆能蒙教化之惠。其他各種文化設施與宣傳亦隨抗戰之進展而

日加熱烈，故一般人民之水準，較戰前有相當提高。此種改進雖只限於後方，且亦只止於都市附近，廣大之農村仍尚待努力。但有此基礎，戰後亦即易推進矣。

人民之習性方面，則因此次抗戰亦有極大改革。第一、因此次神聖抗戰動員範圍之廣，使每人對國家發生明切之認識，知國家之存在實高於個人之存在，在其自我生活中，已產生之利益更高於其日常生活團體概念，即在淪陷區內之人民，亦因敵人壓迫之愈烈，而愈產生強烈之國家觀念。第二、此次因抗戰抗所生之人口大移動已使人與人之間接觸廣泛，且抗戰中各種工作皆需要密切之合作，工作之分配亦逐漸就軌，有才能者已不必賴他人之援引，逐漸有上進之機會。故不但個人之自私心理，因此改進不少，即地方觀念與家族觀念亦有著目之改變。

其他農民習性雖不能望其於短期內產生可辨別之改革，但因後方工業化之發展與都市生活之發達，以及人民訓練之普及，即此種習性亦在迅速改變之途中。

不過戰時之此種改進自亦有其相當之因子，如抗戰數年後因物價之高漲，與私人生活之困難，於是乃使不少人復忽略全民族之利益而圖謀私利，此種行為雖僅為經濟方面者，但確將影響及全社會之心理與觀念，若戰時不能迅速勝利結束，而物價又無適當管制，人民之苦樂復不能使合理的平均，則此種傾向對正在改革途中之人民習性，復將發生相反的阻礙也。

第五章 工業化與將來解決人口問題之方針

我國過去之人口問題，雖因抗戰之發生而有顯著之變更與改良，但其基本缺陷仍未解決，如人口之決對過剩現象在後方雖已消滅，但人民之生活並未提高，且將來戰事終結，戰區與淪陷區內之人民生活尤待解決。人民之品質習性，雖亦大有進步，但此亦係戰時環生之附從成，和平恢復後，如不另設法使其繼續改進，則雖不致仍返原狀，其進度必將遲緩。且全國人口經此次戰爭之移動，已使原有之人口密集狀況大為改觀，若戰後不積極設法，使之合理再分配，則因襲之力量，將更有恢復過去少數農業區域過度集中之危險。

故吾人在戰後必先具體解決將來人口問題之方針，然後能使中國人口之發展入於正軌，且此等問題之解決，亦實為促進工業之一種重要手段。由第二章第二節所述亦至為明瞭。中國戰後人口待解決之問題，不外五點：（一）提高人民之生活。（二）人口增加速度之限制。（三）人口之合理再分配。（四）減少人口之死亡及增進人口之品質。（五）改進人民之習性。但此種種問題雖各有其個別之解決方法，而其方法之基本又莫不與工業化相關聯。因如第二章中所述，中國過剩人口與品質習性不良之原因，實在中國過去停留於農業生產階段上者過長。故解決此等基本問題之途徑，亦必在此種生產方針之根本變易，而農業生產方式之變更，又不外工

業化一途。故以下即就解決此五問題之方針及其與工業之關係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節 人民生活之提高

欲圖人民生活之迅速提高，其方法不外兩種：一為減少現有人口數量，使每人對現有之財富，能多分配；二為增加現有之生產，使每個人可獲得更多之財富。減少現有人口數量，不外移出人口與減少生育兩途；增加生產，不外改良農業與工業化兩途。此四種方法雖同為提高人民生活之途徑，但其效果則有強弱。

移出過剩人口為提高國內人民生活最簡單直接之方案，亦曾有若干國家實行此項辦法，但從未因此對任何國家之人民生活予有效解決（註三八）。中國人民之移出雖非現代工業，國家移民至殖民地時，因生活程度不同而發生之困難，但一方事實上並未有無限地納移民之土地，在戰後雖須國際合作，但亦決無自由任人移居之國家；他方在農業社會中亦不允大量移出之障礙，如中國過去沿海各省人民歷年向外移出者為數雖非微小，據估計戰前海外各地華僑已在千萬人以上（註三九）。但此種移出對中國過去人口之過剩並未能有所緩和，此不外移出之數量對全人口之比則仍屬過小，而其所以不能再多量移出者，雖係因他國限制移民，但事實上亦因農村社會為維持殘留者最低限度之生活計，必須保留一定數量之人口，同時農民又係安土重遷，只須故鄉有一線之生活機會，即不願覓食他鄉，故亦不容更多之移出。

減少生育實爲過去解放中國人口過剩之一基本方法。但際茲戰時，因戰事所損失之人口巨大，政府政策與社會輿論，反多傾向於獎勵生育方面；故吾人雖認爲戰後人口之更大的增加，仍爲促進戰後經濟發展以及提高人民生活與品質之必須條件；但不能於此時再倡減少生育以圖人口之直接減少。此點將於下節再詳加討論。

由農業之改良以改進中國人民之生活，則似若言之有據，常爲國內多數人士所樂道者，但此法實亦難解決吾人之問題。因此時所謂之農業改良，自非指農業之機械化而言。若農業已達機械化之程度，則一般生產普通之機械化必業已發達，農業之改良不過爲工業化之一部，若所謂之農業改良僅指耕作方法之改良、耕地之增加，作物之改良增加等等，則對人民生活程度之提高，仍不能產生若何顯著之效果。因如僅增加耕地或僅改良耕種方法與作物，而不並伴以其他變革（如機械之廣泛使用及人口之吸入工業等），則此產物之微細增加對農民之生產從可暫時稍有改進，但此改進亦適足鼓勵將來農村人口之更大增加。在此種情形下，由耕地增加與耕種物改良所得之剩餘生產，皆立即將被此新增加之人口所消耗，而仍返以前之人口過剩與生活低下之狀態。此種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已早爲學者所指出（如湯溥生博士）（註四〇）而中國歷史上之飢饉循環，對此點亦早予證明。因中國過去每當國家安定農產豐收之時間，戶口必大增加，此種增加不久即消耗一切農產豐收之剩餘，一屆荒年立即發生飢饉，生活程度乃又降低矣。

是故欲由根本提高中國人民之生活，必須另有更基本之途徑，而此途徑厥爲工業化。工業化之所以能解決人口過剩與提高生活者，實因其能改變一國之整個經濟狀況與經濟關係。第一、工業化將大量增加工業及與工業相關聯之商業交通業部門內之新事業，而各事業內之分工亦將愈趨細微，因而創造多數之就業機緣，以吸收過剩之農業方面人口，如德國在一八八二年工業化開始時，有業人口中，從事農林業者約佔百分之四十二至四十八，在商業交通業中者爲百分之八，而在工業中者僅百分之三十六；但至一九三三年時，農業有業人口即銳減至百分之二十九，而在工業中者則增至百分之四十，在商業交通業中者增至百分之十八（註四一）。工業化僅五十餘年，即將農業人口之三分之一轉入工業及其他相聯之專業部門，卽就中國言，戰前僅上海一市之工業亦曾維持二百餘萬之工人及其家屬。此等人口之吸收對提高全國人民之生活作用固屬微之，而江浙一帶農村人口之能較內地富裕者，土地之肥沃雖不無關係，但其過剩人口之能流入工業，實不能不謂爲一重要原因。第二如前所述富工業未發達時爲求農業之增產，主要賴增加人工。但若工業化成功，機械化農具與化學肥料等之應用普及，則農業生產所需之人工已可代以資本，於是農村不再需要經常保留多量之人手。如江浙沿海沿江一帶農村，能任多量人口流入工業，而並不影響農產之減少者，亦莫非因有上海等地之工業基礎，農村乃能應用相當之機械工具（如煤油車水機），以代人工之所致。第三、工業化發展，可使物質生產增加，國家財富增大。因工業化後，不但本國各種潛藏之資源或向以極低廉之價格被他人購取之

原料可以自行開發利用，尙可以本國所不能完全消耗之製品，換取其他自產不足或不能自產之必需品，如國民營養所需之食料等。其結果自使財富總額與各人所能支配之物資皆將增加。且若工業更能高度發達，則尙可輸入他國之原料自行加工，或供本國之消費，或以之再輸出以獲得差額之盈餘，皆更可增加國民之財富。第四、隨工業化之進展，各階層人口之收入皆得增加。如由農民變爲工人後，工人之收入，與生活即較農民爲優，已可由前舉農工人生活費之比較窺見。而工人本身之收入，亦將因工業中機械使用之增加，工人效能之提高而逐漸增加。如英國工人之實質工資指數，設在一八八〇年時爲一〇〇則一九〇〇年時即已增至一三二〇至若農民亦將因農業人口之減少，農產物因技術改良與資本投下增加而引起之產量增加，以及農產物在國內用途之增廣等原因，而增加其收入，於是一方人民之收入增加，他方物資之供給增多，則人民之購買力與所能獲得之物資增大，生活程度亦自能提高矣。

第二節 戰後人口驟增之限制

如前所述，我國人民生活之提高，既須賴工業化以圖基本之解決，但吾人亦已知中國過去人民生活之低下，以及工業之不發達，亦實因我國人口與他國相較，不免過剩。此須抗戰中雖對人口絕對數上有相當減少，但在總人口所佔之成份仍屬微小，除非戰事極度延長亦不致有極大之減少，故在戰事終了之後，中國之人口絕對數量，在其他國中仍將居首位。如以過去世界

人口之增加率計算，則即人口已極衆多之美國，亦尚須一百二十年以後，始能追及中國現在之人口。且此時和平恢復軍士復員，工業化亦將大規模着手推進，故生育亦必大將增加，而死亡亦必減少，尤以死亡之減少更將迅速，故此時期如前世紀歐洲之情形，人口必又將大增，此種增加在人口素稀之國家，故爲供給戰後經濟恢復以及工業發展所需之人力與勞工之絕對有利條件，但對人口已極衆多之中國，則戰後之此種增加，無論對工業化之進行或人民生活之提高皆有不_利之影響。因如人工之供給過多，則機械之使用必將受阻，如消費物質者過衆，則由工業化所獲之成果必又將大部被消耗，而資本不易積蓄，生活亦不易提高。

此外一國人口對該國之貢獻，不僅在其數量之衆多，更依存於其品質之優劣。品質優良之人口所能勝任之工作，遠勝於數量更多但品質惡劣之人口。工作結果之總量，實不應以從事工作之總人力計，而應以每人所能發揮之效能總量計。故在一國人口之效能皆已達極高度時，固可再易增加人口數量，以增進其國力，當一國人口皆未能發揮其應有之效能時，品質之改進，實先於數量之增加。能欲促進品質之改進，數量之增加又不能不先加限制，因若數量繼續增加，則每人所能享獲之爲改良品質所增之施設與利益，亦必相對的減少也。

但吾人於此時主張限制人口之增加，似不免有違時之議。因我國過去人口雖屬過多，而在此次抗戰中吾人實受人口衆多之利益，有如許龐大之人口，始能在缺乏一切近代技術之環境下進行抗戰建國之大業。故戰後獎勵人口增加之不暇，豈能提倡限制人口？

惟吾人須知我國人力在此次抗戰中之貢獻，實係由莫大之犧牲而來，不僅今後之立國不宜再有此現象，即工業化之目標，亦不外求以鋼鐵而代血肉。縱令戰後人口總數稍少於戰前亦不足影響工業化初期所需之人力供給。因下舉限制戰後人口增加之政策，決不能於戰後立即發生效果，而戰事一完出生率與死亡率必將恢復，且中國人口之年齡構造，依過去各種調查之研究，大約在增進型與穩定型之間（註四二），即使此種構造因戰時青壯年之死亡而稍有變動，仍以中國人口總數之大，自然增加數仍可觀；且若此時工業化飛躍進展，則死亡率之減退必更趨迅速，於是不但因戰爭所受之損失可迅速恢復，不久尙可有更大之新增人口以供工業化之需要。此外吾人已知中國人口之性別構造尙爲男多於女，若直接受戰事影響之區域，因此次戰爭此種情形似亦無甚大之變更（註四三）；此種構造於今後工業化初期人力之供給之進行亦極有利，因我國今後工業之創設，必先由採礦動力以及其他基本重工業上入手，而此種工業必須巨量之男工也。故吾人主張限制戰後人口之增加，不但有利於將來，即對戰後之緊急需要亦無惡劣影響也。『限制人口增加之直接方法，通常自首將舉節制生育，但此法如上節所述，在戰時不易宜於提倡；實際上縱令提倡，亦未必能生若何效果。因生育之多寡爲自然之現象，主要受生理環境等因素之支配，在今日醫藥衛生知識發達之時代，個人之意志對左右生育多寡之能力雖亦甚大，如避妊方法之應用。但此種意志之轉之變，亦實經濟及生活上各種原因之規定。若社會無使人不願多有子女之客觀原因，亦不致有人願採節制生育之手段。』

如在我國於民國十八年山額爾夫人 (Mrs. Margaret Sanger) 曾來華宣傳節育，其後北平婦嬰保健會亦曾有小規模之試驗，但其參加者並不多，其中且以知識份子仍佔大多數，當時亟需節育之貧苦階級，對此反映反少(註四四)。中國之貧苦階級之區別生育率 (differential birth rate) 雖並不較中上層階級大(註四五)。但其人口則佔總人口中之大部份。故欲出生數普遍減低，必須節育觀念能普及於此層人口，始能收效。且中國人口多散佈於農村都會集中傾向較小，已如前述。農村出生率之大於都市出生率，為世界各文明國普遍之現象，由中國現有材料之所示，都市出生率所小者則更多(註四六)，故中國節育之成果實繫於農村。不過中國農村單位過小，散佈過廣，人民知識過低，醫療設備過少，且中國農民寧受極度之貧困，而不願減少其子女者，亦有其客觀之要求在，故欲對這種人口宣傳節育，必將事倍而功半。

故吾人以爲若欲防止戰後人口之急劇巨額增加，與其提倡此種違反時論而效果亦不甚可靠之節制生育方法，不如另覓不與我國戰時人口政策抵觸，而又能收限制人口增加之途徑。對此吾人可舉提高結婚年齡，鼓勵小家庭，打破宗祠觀念諸點。

中國人民(尤其農村人民)結婚年齡之過早，實爲造成中國人口出生率遠大於歐美人口出生率之一重要原因。因不但長期之夫婦生活所生之子女，較短期之夫婦生活所生之子女數多，且個人生育子女之能力，亦隨年齡之增加而減少。但結婚過早所生之子女數量雖將較多，而或因父母之生理發育未臻完健，或因父母之生活經驗與教育經濟狀況未達成熟，所生之子女在品

質上未必能十分健全。故若能將結婚年齡提高至合理限度，則不僅可使所生子女之數量不致過多，其品質亦必較優良。

而提高結婚年齡之方法，在都會中因可由增加女子職業，增加人民智識的促其實現，而在農村中則因中國早婚因襲過久，重男輕女觀念過重，普及方屬不易。故當藉工業化發展之機會，將農村女子儘量吸收入工業以增其獨立之機會，亦自能促成晚婚之傾向。其次對小家庭之獎勵，亦為間接使生育減少之一方。因人民習於小家庭生活後，自不願再受大家庭之拘束，而更願增加其子女。但大家庭之存在本係農業社會之特徵，故可隨社會之發展向工業社會而自然減少。如中國之農村家庭平均人口依各處調查之結果，約為五·三人上下（註四七）；而上海與天津之工人家庭平均人口則為四·六與四·三人（註四八），更就金陵大學之調查，華北農村家庭人口平均為五·四人，華南則為五·〇八（註四九），華南為工業較發達之區，亦可證明大家庭確有隨工商業發展而減少之趨向。更如國民經濟研究所在昆明舉行生活費調查所得之結果，工人家庭已減至三·五人（註五〇），此固係戰爭之影響，但後方工業之發展，當亦為其原因之一。不過此種自然之演變進展究屬遲緩，欲使小家庭之普遍仍須積極獎勵之方；如供給少數人口之工人或工作人員以生活之便利，對少數限度之兒女子以教育扶養上之補助等等皆足使人民樂於維持小家庭。同時若工業化能積極發展，人民之生活與生活皆將提高，人民亦必不願再維持大家庭以度昔日窘迫之生活。

最後過去中國人民不論其個人環境經濟狀況如何，皆以多育子孫爲其一種天賦使命，愈富有與舊道德觀念愈深之家庭，子孫亦愈多，此種傾向受宗祧觀念之影響者實多，故若能打破此種觀念，亦定能減少人口之增加。但宗祧觀念爲中國數千年來深入人心之傳統思想，非由整個社會意識之改革，不易使其改變。故除由一般教育上對此點加以注意外，亦當由工業化之推進，以易個人對家族觀念之根本改革。

以上所舉各種防止人口增加之方法自須在相當年限以後始能發生實際作用；而此時必係戰事完結已久，人口又在因自然力之作用而急劇增加之時。故不但不致與戰事損失補充之觀念衝突，且因此種方法之實行，同時亦可促進工業化之發展，因此可使人脫離家庭之觀念而注重社會之觀，減少依賴之心理，而增加獨立之心理也。

第三節 國內人口之再分配

如第一章所述，我國之土地雖廣，但人口在戰前則僅密集於較富庶之數農業地區，而在此等區域內人口又散佈於每個農村之角落，直達當今農業技術所能容許飽狀態，此種密集狀況，在戰時已大爲變更，但此種變更究係因戰時之影響，向非經濟狀況改變之所致，若能猶此種偏在集中之情形在戰後澈底予以再分配，亦爲減輕戰後國內人口壓迫便利工業化發展之一途。此種移動有兩種：一爲由農村向都市之移動，一爲由人口密集區域向人口疏稀區域之移動。

人口向都市之移動，係隨工業化之發展而產生之自然現象，因一方工業如發達自須吸收新人力，而新興之工業既多在都市附近，則人口自亦逐漸集中於都市。他方工業如發達農業生產亦必改良，於是爲求一定量之農業生產，已不需如先此之多數勞工，此等受排擠之人力，自必逐漸流向報酬較優之工業，如德國在一八八〇年都市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而五十年後之一九三〇時，已達百分之六十七；英國在一八八〇時僅都市人口僅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九，至一九三〇時已增至百分之五十六（註五一）。而莫斯科則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九之十年間，即由二百萬驟增至四百萬（註五二），更係蘇聯工業化迅速發展之所致。中國僅上海一市自民國十九年至民國廿四年時，人口亦由三百十餘萬增至三百七十餘萬（註五三）。但就全體而論，此種移動尙至爲微小，如根據金陵之調查，關於鄉村之各種人口移動中以由田莊移至城市者爲最少（註五四）。在戰區後方都市人口雖大有增加，但此多係由前方轉移，亦非經濟原因之所造成，故欲促進今後農村人口向都市之大量移動，必須更有積極鼓勵之方針。

其一卽爲農業生產方法之改變，如農業生產方法仍係墨守成規，爲獲少數產量而需多數之勞力，則都市卽使有較好之工作機會，農民仍不得不忍受其貧乏之生活水準，而留於農村從事其農耕工作。卽使因外力逼迫而必須離去，當中國之工業發展不足影響充分增加食糧生產時，則農村生產物之剩餘並不能養都市增大之人口，反致阻礙都市工業之發展。故欲使農村人口之大量流入都市，農村生產方法本身須先有改進，俾因農業改進而排出之勞工得以流入都會；

且因此增加之剩餘農產品亦能養都市中龐大之非農業人口。

其二爲都市中工作機會之創造，欲農村人口之流入都市，則都市方面必須先有確實之工作機會存在，欲創設此種工作機會即須先使生產事業集中於都市中。在中國地域廣闊交通不便之情形下，尤當增加分散式之新都市，在此種都市中創設各種新興生產事業，然後始有大量吸收勞工之可能，若政府更對勞工之供給與分配能有計劃執行，則農村勞工之流入都市乃更易實現。

其三爲交通之改良，交通之改進固爲工業化本身所必需之條件，亦爲便利人口移動不可缺乏之條件。不過爲實行工業化所需之交通條件較嚴，因彼時之交通主要爲聯絡原料與市場或動所困，故必須有完備之載重致遠之交通工具。但爲便利農村人口之流入都會，因僅係客運，則不必待十分完備之交通設備亦可實現，故人口之於都市集中，實可發生於鐵道交通能聯絡窮鄉陋里之先。

爲減少過去國內人口偏在集中之弊害；除由農村吸入都市外，亦可由將人煙稠密區域之人口吸往地廣人稀之區域而獲解決。此種移動之傾向——如由沿海之移入於地，已由抗戰促成；若更因工業化之發展而促進交通之發達，如新路線之開闢，車輛等之增加，運費之低落等等，則原料製造與市場間之聯絡便利，大量之人口更可分配於有利於工礦等生產之地點，而不復再匯聚於少數土地肥沃之區域，尤以礦業發達不但將吸收多數採礦工人於礦區域且重工業亦必聚集於礦區附近，更可造成人口集中之新中心，如雲南之大理一帶，西康之西昌一帶將來必皆成爲

重要之工礦業區域，一若德之魯爾（Ruhr）及美之菲拉德爾菲亞（Philadelphia）等二礦業中心，此等區域實可容納不少一向密集於內地少數農業地帶之人口。

此外向邊疆之移居亦極重要，中國邊疆各區，地域廣大煙稀少，如西藏邊地人口密度如每方公里僅五人，蒙古高原沙漠地帶僅二人，興要嶺山脈地帶五人，東滿山脈地帶十八人，松遼平原亦不過三十四人（註五五）。此等區域除後述二者外，雖不適於耕種，但皆為良好之礦產及動植物資源之產地。過去除華北人口曾向東北大量移徙外（如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間，等年最少有四千萬人，多時達百萬以上）（註五六），至蒙藏新疆等邊區，則因種族語言氣候風土習慣之特異以及交通之困難，幾無肯背井離鄉移往邊地者。今後若因內地工業之發達與對此等區域交通之改進，則不但此等邊區可吸收不少內地過剩之人口，僅就東三省與蒙古之未墾地而論，據估計至少尚可供六千萬人之生活（註五七），已能成為莫大之中國本部工業原料供給地，並為工業製品開闢莫大之銷場。即不由減少人口壓迫之見地，僅由增加中國人民向外發展之冒險精神與打破家族觀念之觀點，此種移居之獎勵亦大有意義。尤其當戰後復員之際，另求職業之人口一時驟增，此種人口既多無適當之工業生產訓練，農村又因生產方法之改良而不需前此之衆多工人，此種移居當能解決多量人口不能就業之困難。不過今後設施行此種移民方法時，須予移民以永久之生活根據（如分以上地），保障其生命財產人權，始能使其攜家以赴，而不復如中國以前移民之皆為一時性質，不能大規模促進該地之恆久發展也。所幸戰時亦

在極力提倡向陝甘西北等地移民，在戰後交通發達，則此種風氣，不難更推遠一步也。

第四節 死亡率之減低與人口體質之改善

吾人之所在第一節主張限制將來人口之增加，而違反獎勵生育時論者，實因過去中國之生育率，已至人類經驗生育之最高點，而死亡率亦為在平時近常條件下之最高者，但大有顯著減少之餘地，故與其提高獎勵生育，不如減低死亡率，其結果雖同為促進人口之自然增加，但其影響則大有差別，因死亡率若降低，則所增之人口必為優良之人口，若僅能增加生育而不能減低死亡，則徒增加一國人力之天然暴殘而已。故若在戰後能勵行死亡率之減低，則人口之增加必將異常迅速，即極力提倡限制人口之增加，在較短時期內，亦決不能遏止此種趨勢，故吾人之主張，決無害於戰後人力之供給。

減少死亡率實與改善人口體質同為一事，固知人口之體格健康改進，其壽命自將延長而死亡亦自將減少。改善我國人口體格與健康以及減死亡率之方法，不外兩種：（1）衛生與醫療制度之極積推進；我國近來衛生與醫療制度不能不謂為已有相當之進步，但反顧中國人口之衆多，則此種進步尚不足應全國需要之萬一，且除都市外，廣汎之農村幾尙完全未見新式衛生醫療設備之踪跡。故今後一面當在大小都市與縣鎮加緊促進一般人之衛生教育與宣傳，同時充實衛生與醫療之設備。一面當利用巡迴之醫療與衛生宣傳制度，以期保健工作遍及於農村。且中

國之死亡率以嬰兒死亡爲最高。爲減少嬰兒之死率，更須特別注重收生，育兒與托兒施設之普及。(2)食品之改良。中國一般人民(無論於農民或都市工人)營養上之缺欠，主要爲蛋白質品質之不良，鈣與磷之不足，脂肪質既稍嫌不足質亦稍欠佳，維生素甲丙丁皆稍少，後者尤甚(註五七)，此種缺欠足使中國人民之體格發育不良，健康不易維持。至若營養上之所以有此缺欠者，實因中國一般人之食物百分之九十七皆係植物性者，對正常營養必需之食物如雞卵牛乳肉類等之食用過少。嬰兒死亡率之過高，以及兒童時代身體發育之不全，更多因中國兒童能享用此種營養物品之機會太少。補救之道，固不乏種種應急之策，但欲求根本解決，則必待增加此等動物性食料之供給。不過凡此種之改進，實又賴工業化始能促其進行，如欲增加動物性食料之供給，必須澈底改革中國現在之農業生產方式，否則亦須藉國際貿易以換取此種物品，如英國本國素乏畜產，而國民營養未嘗或匱乏是也。而實非積極發展工業增加生產不可。

又如醫藥材料之增加，亦必待工業化以增進其製造，始能普遍供給，且如工業化發展，人民衛生知識亦必增高，於是疾病之豫防亦較易。故此種改革實須與工業化相併進行。如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死亡率尙爲百分之二十五，因其後工業化之加速進展，至本世紀三十年代時已降至百分之十三，又如德國人零歲之希望年齡，在一八〇七至八〇年時尙僅三十六歲，至一九三四時已達六十歲(註五九)，而此時期亦正爲德國工業化加速發展之時期；即我國在美華僑，二十歲時之希望年齡亦達三十六歲(註六〇)，較國內人口所高甚多，亦莫非因美國工業社會環境

之所賜。

至於改良國民生活習慣與提倡體育及冒險精神，對增進人民之體質，尤爲切要，農業國家之人民，精神萎靡身體莽拙素爲普遍之現象（註六一），中國則更因歷代和平時期甚久，一般人士習於文弱，以致人民之生活習慣更多傾於頹廢退縮，至近年以社會變動劇烈，人民多存苟且偷安之心理，乃使此等頹廢之生活浸淫愈甚，賭博及酒肉徵逐之風，彌漫全社會，而於上層階級爲尤甚。此等習慣影響於體格健康者至鉅。此等不良嗜好，除應加以強制之禁止外，更須積極創設代替之良好生活習慣，提倡國民體育及冒險精神以爲革風易俗之本。且此種生活習慣之改良，非獨增進人民之體質，亦維持社會秩序，增加人民知識與鞏固國防之道也。

不過此種改進亦須與工業化同時進行，始能收積極之效果，因近代工業環境需要緊張與有規則之生活，需要持久耐勞之體格，需要冒險進取之精神，欲在此種環境內求生存，即必須使其生活情形適合此種條件不可也。

第五節 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與習性之改良

改進人口品質之另一重要項目，爲人民教育程度之提高。欲提高一般人民之教育程度，須先圖教育之普及。欲求教育之迅速普及，唯在增加義務教育。所謂義務教育應包含小學教育與公民教育而言，此種教育在文明國家固早已採用義務教育方式，但在中國今後即對小學教育以

前之幼稚教育與小學教育以後之一部份中等教育，亦當列入義務教育範圍。前者因兒童教育之基礎實自家庭教育起，兒童在家庭環境內所受之影響，實爲其將來習慣與成就之基礎。如高爾頓（Galton）卽早已指出母親對子女影響之重大。但中國人民既多爲未受教育者，貧苦家庭中

之惡劣習慣尤爲深痼兒童之習慣既已養成。已不及藉小學教育爲之補救。若期一般人家庭教育有所改革，又非短期內所能奏效，故國家自身實應負起母親之責任，對未達學齡之兒童亦當予以義務之幼稚教育，如普設免費之幼稚園等。至中等教育之目的不外兩種：一爲探求高深學理之準備，一爲養成具有普通技能而有用之個人。前者雖爲發展一國科學文化之所必需，但一國之高等教育機關爲數不多，且受中等教育者，亦不必盡有探求高深學理之能力；則此種無更加深造之機會或能力之青年，如僅受爲準備深造之普通中等教育而止，則反不能養成若何實用之能力，此種危機在今日我國已被識者所憂。中國地廣人多，凡百事業落後，爲今後之工業化計固須多數之高級指導人才，同時更須大量養成不需洞曉高深學理之基本幹部。而此種幹部之養成，實有賴於中等之職業教育。故除必須提倡之高等準備教育外更須普及義務性質之職業專門教育，俾多數人民成爲現代經濟制度下有效之個體，不過此種教育普及之遲早，亦依存於工業化發展之速度，亦屬目明；因工業化後國家之收入增加，對教育設施亦較易普及，私人之收入增加對子女教育負擔之能力亦增大。且當多數人口之職將由農業轉爲工業後，多數工作皆須長期之學習，而在現代之社會制度下，學習時期愈長，將來所得報酬亦愈高，於是更增父母對子

女受教育之願望。如美國因工業化及生活程度之增進，在本世紀初三十年中受高級教育之青年大形增加，全國十四歲至十八歲之青年中入高級學校者，在一九〇〇年尚有百分之十，增至一九三四年已達百分之五十六（註六二）。

此外教育之方式對文化與工業之發展，亦有重大之關係，教育方式有如英國之尊重自由與傳統，注重個人才智之啓發者，有如德國之尊重系統與紀律，注重整齊劃一訓練者。在國家文化基礎已深，傳統優良社會進步之國家，應採用前一教育方式；但在文化較淺，傳統缺乏之後進國家，則以後一教育方式似易於促進國家進步。如往日德國尚未在物質科學嶄露頭角時，已在一一般教育中注重普遍齊一之規律訓練，在高等教育中注重普遍養成專門知識與大量普及科學實驗研究，因此之故德國在今日已居科學界以及多數工業部門（如化學工業精密機械等）之領導地位（註六三），中國人民素習於自由放縱，社會傳統與固有文化亦不適於今日之生存競爭，故欲促進今後工業之發展與社會之改革，則今後之教育方針亦當採用有系統與整齊劃一之強迫訓練，然後始能養成守秩序有紀律之一般公民，造就衆多能力充實之專材也。

最後人民習性之改進亦當爲我國今後廣義的人口政策之一重要詳題，且爲促進工業化尤屬必要。我國人民習性之改進，首須革除不合時代之惡劣習性與心理，關於自私心理之改革，務須使人民心目中存有一軌範一已行動之更高利益共同團體，並能使其認識自我僅爲構成此大團體之一員，而非遊離之個體。即有一時利於小我而違反大我利益之行動，其最終結果亦將不利

於己，欲使人民有此自覺，自須由提高人民知識，促進人民之教育入手。此點頃已述移，但若僅有此形式上之啓發誘導，而無足以促進此種心理改變之客觀事實與環境，則其收效仍不能迅速。而改革自私心理所需之環境，第一即爲與外族之接觸對此點如第三章所述今日之抗戰已予吾人以絕大之效果。若今政府更積極建設清明之政治，嚴厲執行公正之法律，建立合理之經濟關係，消除特權階級與非特權階級之對立，提高個人之政治經濟地位，保障個人之人權；則在個人心理上，大我必漸勝過小我。第二再由積極之工業化以改善人民之生活，發展人民之個性，增加協作互助之精神，使人民皆知個人爲構成全體之一份子，無全體亦無個人，繼爲個人打算而違反全體之行動，不但將使全體受害，其個人亦將受損，則其個人之行動思想自必顧及全體，自私心理自亦逐漸變革矣。

減輕家族觀念地方觀念之方法，一面固須致力於打破宗祧觀念崇虛思想，提倡節制生育與獎勵小家庭；同時使國家社會厲行公正嚴明之人員任用制度，使有能有識者得有自由上進之機會，其才德不能稱位者，難利用緣引倖進而尸位素餐，更宜藉社會保險老年年金義務教育等制度，以減少個人對家族之依賴，則家族觀念鄉里觀念自可減輕。一面亦當積極促進工業化而有所改進。因工業生產須積多數人之分工合作，其交換與分配各過程又機使全社會構成人員發生直接間接之聯繫；人與人間接觸廣泛，社會生活有各方面之結合樣式，家族與鄉里不復爲社會生活之唯一中心；工廠與工業都市更爲多數集聚工作與生活之場所，尤可訓練個人間之合作。

且事業工作又多須專門能力，個人獨立之機會較多。依賴家族鄉里關係之需要較少，於是家族與鄉里觀念亦將自漸減薄。至若其他種種農業社會之習性，亦可利用在學校教育公民訓練，職業學習爲之矯正同時更由生活與工作習慣之改善而圖其改革。同時亦可由工業化以促其改進，因如工廠工作必須嚴守時間，使用機械必須精確敏捷等，皆可矯正。

再者吾人爲促進今後工業化之進展，乃至樹立今後之新中華民族計，除改革我國人民習性之固有缺點外，尚須積極建立新時代之人民習性與人民精神。如獨立不阿，積極進取，負責認真，先公後私等等，皆爲亟當養成之習性。有此種習性，然後作事爲人始能不敷衍，不苟且，不徇私，不偏狹，積極前進，日益求新；庶個人之本性能力始能儘量發展，狹小自私之心理可望免除。

此外吾人亦當儘量吸收與模倣其他民族之優點，藉以增進吾華民族之優越性。如德人誠懇坦白之態度，孜孜不倦之精神；英人冷靜之理智，鎮定之動作；美人冒險敢嘗試之魄力，創造之機智等等，皆爲可資吾人效法之優良習性。

不過此種新習性之積極養成，仍須一面由增加教育與宣傳，以促進人民之理解，改良一般人之日常生活習慣，以移植此種新觀念，一面另由物質方面樹立養成此種習慣之新基礎，如清廉公正，有效率之真正民主政治，分配制度之改良與人民經濟地位之提高等等，均其先決條件也。

第六章 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過去人口問題之癥結，在人口之絕對過剩與生活程度之極端低微，以及品質習性之惡劣。至其原因則主要須歸究於中國過去滯留於落後之農業生產階段時期之過久，故其基本解決之途徑亦唯有根本改變社會之生產方式。而其生產方式之改變不外由農業發展至工業，故欲達此目的惟有賴於加速進行工業化。但工業化之成功非一蹴可就，而工業化對人口狀況所能發生之變革更非短期間事，且此種狀況之存在實予工業化之發展以重大阻礙，故吾人不應僅俟工業之進行而所具自然改革，尚須另定方針以積極解決往昔之種種癥結，如此則不但工業化之進展可早日期成，同時亦使此種狀況及缺點能早獲改革耳。

故吾人不應僅俟工業之進行而聽其自然改革，尚須另定方針以積極解決往昔之種種癥結，幸此次抗戰已自然地供給此種改革之基礎，戰後能再對本文所舉各種方針逐步執行，則不但過去人口狀況缺點能早獲改革，工業化亦將早日期成。惟此種種改革方針索涉過高，或不免有寬汎之感，同時各種解決方針，亦以鉅大之政府支出爲前提，但此種支出無一不平等於對政府極有利益之投資，如減少出生與死亡可節省社會物資無益之消耗，改善體質與普及教育可增人民之生產能力是也。

最後吾人對戰時盛行之獎勵生育呼聲雖另有專文討論（註六四）尙欲於此更進一言，藉以闡明吾人主張之宗旨，戰時提倡獎勵生育之理由，主要自在戰時人少需要之增加，與供給之減少，同時於此次歐戰情形，凡屬積極進取之國家，在戰前多採取獎勵生育政策，而對生育之增減不甚注意之國家，多爲退步保守之國家。故提倡獎勵生育亦實爲鼓勵人民前進精神之一種方法。此兩種目標皆極正大，亦爲我國戰時與戰後所須採取的人口政策，只是欲達到此種目標，作者以爲與其提倡增加生育，不如努力以圖減少死亡。

第一、吾人認爲在中國提倡獎勵生育在理論已不可能。因生育之增加必有一定之自然限度，若一國之出生率已超過此種限度，未必再能用人力自由增加。此種生育增加最高限度，就純個人之生育能力言，儘可倡高至千分之七八十（因每婦女在其全生涯中可生至二十上下），但生育雖爲自然現象，但亦同受社會環境之影響，而在社會經驗中，過去之出生率尙未超過千分之四十者（英國最高爲十九世紀六十七年間千分之卅五強，德國稍微曾達千分之卅九）。中國去之出生率既已接近此境界，則在生理上似已恐無再增加之可能。在戰時如前述生育目將減少，但亦如前述此種減少，因中國係農村社會，其影響當不致甚大，且若有此減少，則若其基本因素減除去，（如戰時之流浪，基本生活之不安），亦非徒事鼓勵之所能生效。最近如各都市中，棄嬰之衆多卽爲一明證。

第二、縱令生育尙可增加，則由以下理由，亦可代以減少死亡之政策，因（一）現在獎勵

生育，如欲爲彌補戰場上之損失以及增加努力之供給，則屬緩不濟急，因此時所生育之嬰孩，須十五、廿年後始能變爲可用之人力。（二）中國之死亡率素大，以嬰兒死亡之率爲尤甚，若再增加生育，若死亡不降低，則徒增自然之浪費，並不能增加人口。且縱不增加生育，若死亡之減少，人口之絕對數反可增加，且其增加反多含當時可用之人口。（三）欲獎勵生育，必須政府有巨額之支出補助，始能生效，（如德意之生育補助人口）與戰時無此巨款，且若以此巨款提倡獎勵生育實不如以之充實減少死亡率之設備，尙易見實效。

於是若在戰時以減少死亡之政策代替獎勵生育之政策，以圖增加人口，其結果而其對戰後之影響則大不相同矣。

註一：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171.

註二：前者根據中國經濟年鑑第一編上卷，「人口」章，後者根據中國經濟年鑑第三編上卷「人口」章。

註三：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p. 40.

註四：中國經濟年鑑第一編，上卷「人口」章（民國十七年內政部數字計算）。

註五：翁文灝：中國人口分佈與土地利用。

註六：此人口集中之五區並非僅含平原，山地反佔其總面積之三分之一，故與各國由總面積而得之密度相比較，並無不合理之處。

註七·Statistisches Jahrbuch fuer das deutsches Reich, 1937,

Mternationale Uebersichter, s. 7.

註八·Warren S. Thompson, Population Problems, 1935, p. 302.

註九·Boris Torgosheff, Chinese Critic III (1930), 317-322;

G. B. Cressby, 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 1934, p. 210.

Foundation 1934, P. 127.

註一〇·China Year Book, 1935-36, p. 127.

註一一·同(註七)S. 16.

註一二·中國經濟年鑑，第三編「人口」章。

註一三·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le, Chapter. 2 & 7,

F. J. Thompson, *ibid*, p. 425, Carr-Saunders, *ibid*, p. 45-46.

註一四·S. Thompson, *ibid*, p. 426.

註一五·J. E. Meade,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1936. p. 233.

註一六·Carr-Saunders, Population Problems, p. 47.

註一七·中國經濟年鑑，第二編，「人口」章。

註一八·國際勞工通訊，五卷十一期，中國勞工階級生活之分析。



註一九：中國經濟年鑑，第三編「人口」章第五二表及四七表。

註二〇：同（註七）S. 19.

註二一：中國經濟年鑑，第八編「人口」章。

註二二：同上。

註二三：孫本文，論我國人的平均壽命，昆明中央日報副刊，廿八年

註二四：同（註七）S. 22.

註二五：張君俊，中國民族之改造，民國廿六年，十一面。

註二六：新華日報，民國廿九年八月六日。

註二七：中國經濟年鑑，第一二三篇「人口」章；喬啓明，如何健全人地之合理關係，時事報類編特刊六十六期，二六面。

註二八：Carr-Saunders, World Population, p. 390.

註二九：中國經濟年鑑，三篇，上册，（B）四二——四三。

註三〇：Meado, *ibid.* p. 266.

註三一：同前，P. 268.

註三二：轉摘自廿九年二月廿六日雲南日報。

註三三：卅二年四月五日重慶各報。



註三四：中國經濟年鑑，第一篇「人口」章第八表；三篇「人口」章，第十五表。

註三五：Statistiska årsboken, League of Nations, 1935-36, -31.

註三六：中國經濟年鑑，第一篇，上卷，「人口」章，第十五表。

註三七：周尚，青年體格標準，大公報廿九年十月十三日。

註三八：Norman angell, Raw Materials,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War (史國綱譯，世界原料與殖民地問題序言，四六面，Cox, Population Problem 漢譯同氏人口問題，五四面)

註三九：陳達，人口問題，三五四面。

註四〇：U. S. Thompson, *ibid.* p. 61-63.

註四一：St. Jahrbuch f. d. d. R. S. 20.

註四二：根據中國經濟年鑑續三兩篇所載，各專家在河北定縣五二五五家，河北等十一省二十二處，河北定縣大王樺村及安徽等七省十六處以及金陵大學在中國南北兩部五十九處調查結果予以平均，所得中國鄉村人口依年齡之分佈約爲：零歲至十五歲——三八%，十五歲至五十歲五一%，五十歲以上一四%。

註四三：如廣東省銀行季刊一卷一期。一八四面所載該行對十五縣中一千六百餘借款農戶之調查戰後農村人口性別比率，仍爲男子一〇八對女子之一〇〇。

註四四：中國經濟年鑑，第三編，「人口」章。

註四五：陳達，人口問題，二九六面。

註四六：中國經濟年鑑，續編「人口」章。

註四七：同（註四四）。

註四八：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二十三年；十一面。

註四九：中國經濟年鑑 三編，「人口」章。

註五〇：劉鴻萬，戰時的物價指數，經濟動員，十一二期合刊，二十面。

註五一：W. S. Thompson, *ibid.* p. 302.

註五二：Asia, Nov. 1940, p. 573.

註五三：民國二十年上海市年鑑，〇一三三三。

註五四：同（註十九）。

註五五：Cressy, *ibid.*

註五六：江文漢，滿洲移民，世界書局編中國人口問題，二十一年，一五一面。

註五七：湯壽生氏對中國人口問題之意見，新經濟三卷十期，章相爾：中國人民生活程度

改進的展覽。

註五八：J. B. Buok Land Utilization of China. 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沈同湯佩



松，國人的營養問題，廿九年八月卅日益世報。

註五九：St. Jahrbuch, s. 20.

註六〇：孫本文，前文。

註六一：李士特，國家經濟學，王開化譯，一七八四。

註六二：A. R. Swozy,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 1940. p. 70.

註六三：A. Manshall, Industry and Trade, p. 1830. Trade P 1830。

註六四：劉鴻萬，戰時的人口政策，新經濟，五卷四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10208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 31324 號)

工業化與中國人口問題 一冊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劉 鴻 萬

主編者 國民經濟研究所

發行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刷書館

發行所 各 地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安圖字第九九〇號



2.22
134

